

# “回到马克思”与当代性建设

##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金永兵 朱兆斌

**摘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改革开放40年间成果丰硕,其在时代变迁中进行着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开放性与实践性品格。当代中国历史始终伴随着“马克思的幽灵”,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更趋向于“回到马克思”。然而,如何“回到马克思”以及“回到”什么样的马克思的问题需要我们在一种反思性的历史回顾中进行考量。与此同时,在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问题日益突显,这些问题对此后进一步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改革开放;回到马克思;当代性

**中图分类号:** I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19(2018)06-004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键词及当代意义研究”(18ZDA275)

**作者简介:**金永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兆斌,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成果丰硕,回顾与反思不仅在时间节点上是重要的,还对进一步促进深度研究与创造性研究是重要的。在当代中国的时代变迁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根据不同的时代主题而进行着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在整个20世纪,“马克思的幽灵”始终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逐渐脱离政治性束缚而趋向于“回到马克思”。然而,“回到马克思”这一趋向本身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同时,在新时代如何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性的问题也早已被推向了前台。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理论诉求,也是在新时代应对诸多现实与理论问题的必然要求。这些问题必须放在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反思性回顾之中才能得到考量,这对建设与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继往开来的关键意义。

### 一、时代变迁中的问题域转换与话语转型

20世纪之初,诞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借道日本与俄苏传入我国,并逐渐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纵观整个20世纪,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以其强烈的现实意识在当代中国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或为启蒙

推波助澜,或为革命奠定思想基础,或为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在文艺理论领域,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涌现了诸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批评家,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与其在1950年代提出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这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强烈的实践品格,还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持续出版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但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被片面肯定与强化,由此导致的文艺工具论在“文革”时期到达了极致。自20世纪之初到改革开放之前,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是一种包含着强烈政治诉求的理论实践,可谓负重而行。

在20世纪初以来的时代变迁中,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的问题域经历着启蒙—革命—改革交织与更迭的历时性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是与这一大的问题域转换分不开的。随着问题域的转换,马克思主义文论也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话语转型。

“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进入了“新时期”,这一

“新”包含着邓小平时代给予中国民众的社会—政治许诺,即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为旗帜,以逐渐展开的市场经济政策拥抱进步,拥抱富足,拥抱世界。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标识着当代中国在时代变迁中的问题域转换。与新时期的现代化诉求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是一种与既往的阶级论相对立的人学和主体性哲学。人学是新时期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域,马克思主义文论受此统摄,因而也以人学为其主要问题域。这一人学场域包括1980年代前期关于“人道主义”“人性”与“异化”的论争以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创作取向,也可将80年代中期以后颇具影响的李泽厚的主体论实践哲学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论纳入其中。顾名思义,人学以人为本位,而非以社会阶级或政治权威为本位;就80年代前期的论争而言,人学是主张人道主义与普遍人性的,是反对异化的。因此,人学与“文革”时代的政治挂帅与阶级论针锋相对。在“革命中国”的历史之中,钱谷融在1957年便写了《论“文学是人学”》。但是,人学真正在认识—知识论—价值论层面重新得到建构并发挥持久的影响则是在80年代前期。人学话语在批判“文革”之时浮现出来,并在新时期的批判—反思潮流与知识生产机制之中持续复制再生产,最终成为198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也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打开了学科化的空间,使之从一种包含强烈政治诉求的理论实践向一种学科意义上的学理化知识形态转变,呈现明显的“去政治化”和“知识化”倾向。

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个转折点,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首先,“回到马克思”,返本求真,不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只言片语来研究其文艺思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开始以更全面的视角、更大的规模被引入文论学科场域,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文艺和美学》(陆梅林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等。其次,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开始广泛引入并引起极大关注,如《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柏拉威尔著,梅绍武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陆梅林编,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现代美学新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论文精选》(董学文、荣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以及大量专人专著,譬如卢卡奇、葛兰西、萨特、马尔库塞、伊格尔顿等人的学术研究。再次,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持续发展,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得以出版,如《马克思哲学美学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董学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初探》(陈辽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此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马列文论研究》(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刘纪纲主编)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要对象的学术辑刊也陆续出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表平台。

改革开放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打开新的问题域得以可能。如果说人学首先标识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科化则进一步延展着其问题域。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高度关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性的关系,而随着学科化程度的日益加深,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与物质生产的关系以及文艺的本质、作用、地位等问题也都得到了讨论。不过,19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更加侧重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苏联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进入199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规模译介与学科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阶段。在翻译引介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1989—1997)贡献巨大。这套丛书不仅翻译了大批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出版了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冯宪光著)、《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欧力同、张伟著)等在内的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在此阶段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著作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朱立元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新马克思主义”文论》(马驰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进一步拓宽并深化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学者在这个时期开始了“由述而作”,努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自觉地进行中国文艺理论建构,不断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的学科方向、问题框架和一些核心问题,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学科化的实绩,出版了一些具有建树的文艺理论著作,如董学文著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朱立元著的《思考与探索——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等。

从1990年代中期直到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确立与日益深化,全球化与新技术浪潮的推进,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特别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日益靠拢舞台的中间位置,也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进一步学科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参与全球对话、积极应对现实需求与挑战并不断进行自我反思的阶段。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仍然处于这一阶段,并日益深化着这种趋向。显然,这不仅是更大规模的翻译引介、更深入的学术研究所

产生的结果,还是中国日益崛起并更具影响力地参与全球格局的时代状况的结果。随着更多地向外派遣留学生与访问学者,更多地邀请国外理论家前来讲学或参会,国内学者与国外理论家的直接交流变得频繁而深入,日益改变着以往缺乏直接交流的单向研究、输入研究,这无疑有利于国内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度研究。较之1980—1990年代,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仅更加广泛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理论,更加广泛着眼于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外理论家,而且还不断开辟新的研究范围并探索新的研究方式,形成新的问题域和话语表述。

可以说,进入新世纪,全球化已然成为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社会文化景观也越来越与现代西方国家相似,这使得二者具有了在相似性从而在相近问题域中对话的可能。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兴盛、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等自不待言,现代科学与数字网络技术也逐渐渗透进文化艺术及其理论领域。因此,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绝不仅仅是纯粹学术意义上的知识性研究,因为这种研究同时意味着寻找一个审视并反思自我的支点,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并处理本国状况。此外,这些状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未遇到的,但却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事实,因而也构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域。随着问题域的变换,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在进行着话语转型。这首先表现在一些新的理论术语的出现,如“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spectacle)、“日常生活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非物质生产”(immaterial production)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诸多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外理论家一方面提出新的理论术语、范畴,另一方面却试图“回到马克思”,返本开新,并将其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来面对新的现实问题,甚至直接作为其理论支撑,比如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非物质生产”概念便直接受到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谓“机器论片断”的启发。

## 二、“马克思的幽灵”:如何“回到马克思”

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之际出版《马克思的幽灵》(1993)一书,他在书中多有经典之语。例如,“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sup>①</sup>;再如,“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

主义的继承人”<sup>②</sup>。德里达在书中宣告作为幽灵的马克思精神并未随着马克思的死亡而离去,相反,我们仍然必须继承马克思的精神遗产。德里达所谓的“幽灵”(specters)是复数,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幽灵”并非一个而是多个。因此,德里达在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强大生命力的同时,也内蕴着对多个“马克思的幽灵”的指涉。就前者而言,马克思思想的强大生命力构成了我们“回到马克思”的原因;就后者而言,我们则必须讨论我们“回到”的是哪一个或什么样的马克思。

如今我们说“回到马克思”,实际上是指试图准确地回到真实而全面的马克思。从20世纪之初到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承载着启蒙的、革命的历史使命而行,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强烈的历史引力场中难免受到实用的乃至功利化的片面解释。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所谓“短二十世纪”之中持续伴随着某种历史目的的支配并受到征用,因而难以呈现其真实样态。因此,作为当代中国转折点的改革开放成为解放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功利性、政治性束缚而使“回到马克思”得以可能的历史契机。那么,改革开放40年,我们是如何趋向于“回到马克思”呢?

“回到马克思”寄寓着一种返本开新的期待与诉求,而之所以“回到马克思”,也因时代变迁之中问题域之不同而不同。易言之,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问题域,不同的问题域为“回到马克思”提供着不同的理由、路径和诉求。历史地看,这种不同的目的性,使我们如今所谓“回到马克思”与改革开放之初所“回到”的马克思并不相同。

我们之所以在新时期“回到马克思”,原因在于“文革”之后人学成为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域,而人学内蕴着“新启蒙”时代对思想解放的内在要求。我们知道,人学强调人道主义,强调人之为主体的性。那么,在新时期之初,我们回到的马克思是什么样的马克思呢?这一问题颇为复杂,在“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论争中便可见到思想文化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当时参与“人道主义”论争的学者通常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来讨论问题的,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其对人道主义的观点也呈现出差异。一部分人认为,人道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此否定了人道主义;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对立,“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的”<sup>③</sup>。显然,后一种观点与“新启蒙”的时代倾向相呼应。此外,还有人更加细致地对人道主义进行区分。胡乔木在《关

① (法)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② 《马克思的幽灵》,第127页。

③ 汝信《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

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一文将人道主义区分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前者以集体主义为核心,与社会主义事业相关联;而后者则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深具资产阶级的虚伪性。

较之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异化”的论争则更加鲜明地呈现出人们对马克思特定思想资源的利用与放大。对于“文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人性扭曲与行为残暴的现象,过去阶级斗争的思路已然无法解释。因此,随着社会—政治领域对阶级斗争思路的逐渐抛弃,人们更多地倾向于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学说作为理论武器来反思历史。此一时期,出现了诸多探讨“异化”理论的文章,如汝信的《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哲学研究》1978年第8期)、张奎良的《论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历史地位》(《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等。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思想文化场域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人们“回到”的马克思实际上更倾向于一个肯定人道主义与主体性并反对“异化”的马克思,因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必然受到特别关注。显然,这是在“文革”之后“新启蒙”时代的思想解放氛围下出现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西方思想文化著作持续不断的大量引介,中国学界获得了空前广阔的理论视野,为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带来了新的契机。这不仅使我们能够了解与研究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的关系,还能够在马克思与语言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哲学社会思想的关系中多面聚焦。在对马克思的历史还原、理论溯源、思想比较的过程中,我们日益增进着对马克思的认识,这为“回到马克思”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如今,我们显然在学理层面对马克思的认识更加全面而深入,因而更有利于准确地回到真实而全面的马克思。但与此同时,国外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著作大规模引介,对我们如何理解或解释马克思——如何“回到马克思”——也带来了直接的理论挑战,譬如学界比较普遍的“西马化”倾向会不会误读乃至偏转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21世纪以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日益重视可以被看作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回到马克思”的尝试。这不仅表现在关于文本的历史考证与文献发现上,还表现在别开生面的文本解读上。这种文本解读是一种最基本的方法,但对一些艰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言却十分不易。这种文本解读主要出现在近二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如张一兵著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仰海峰著的《走向后马克思:早期鲍德里亚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等。就对马克思著作的文本解读而

言,聂锦芳主编的十二卷本《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颇具代表性。不过,无论历史还原、理论溯源、思想比较,还是基础而又细致的文本解读,大都是方法层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因此也更明显地体现为文本层面的“回到马克思”。那么,我们如何在思想层面理解“回到马克思”呢?

改革开放4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思想层面始终具有“回到马克思”的诉求。如前所说,新时期之初我们更侧重于回到一个肯定人道主义与主体性并反对“异化”的马克思;而如今,我们则试图准确地回到真实而全面的马克思。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精神内核则是重中之重,这直接决定我们如何在“回到马克思”的意义上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就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不仅要重视“中国”,同样还要重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属性构成其得以展开的关键前提,应该走出那种实用的、功利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的征用,因此,不能搞出那种“无边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明确回答:何为马克思主义?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得以展开的首要问题。但是,这里又存在着悖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着的、极具生命力的思想,完全按照一系列非历史的、教条化的标准来衡量各有其历史背景、各有其民族文化特点的研究和论述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属性,恐怕不会没有偏颇和消极的理论后果。这里必须辩证地处理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范式的内在特性与现实意义,既要坚持其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承诺与基本共识,又要坚持其现实实践性、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动态发展特点。

改革开放40年间,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在思想层面已经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应该说,这些共识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相符合。概言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与方法论是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包含着对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中关键原则的赞同和坚持;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并认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理念;对于知识考察本身的一种辩证观点或辩证思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为原则,在既有共识的指导下“回到马克思”。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论应该立足于文艺与社会现实,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时代变迁中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内在要求。自19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网络文学、消费主义等兴盛不衰,新的数字网络技术不仅更新着电脑、手机中的虚拟世界,还重构着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时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性品格在时代变迁之中更加突显其优越性。面对新的时代问题,“回到马克思”意味着我们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要坚守实践性,并在继承之中创造性地应对现实。

其次,与实践性相应,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融汇众

流的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个广泛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的开放体系。在 20 世纪,西方思想文化领域流派纷呈,群星璀璨。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其他思想潮流相结合,产生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论在 20 世纪以来呈现的诸多理论形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本身强大的理论生发力与现实解释力,同时也证明了其开放性。因此,“回到马克思”并不意味着回到某种一元独尊的格局,而是走向一个在多元中确立主导并在主导中容纳多样的开放性格局。

再次,实践性与开放性决定了第三个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文论具有持续创新的动态机制。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还是 20 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都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以持续创新推进自身发展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论持续创新的动态机制包括创造性地解读经典著作(如阿尔都塞的《读〈资本论〉》)、积极应对现实中的新问题(如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自觉地结合其他思想方法(如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不断拓展新的问题领域(如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实践》)、重新思考文化现实(如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等。这种持续创新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使之在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回到马克思”意味着继承理论创新的传统,进一步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动态机制。

在思想层面还存在着其他共识,如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实意识、辩证意识、全球意识、历史意识等。这些思想层面的共识并非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比如,历史意识表现为对研究问题的历史感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化。历史意识意味着引入历史的维度,将问题与对象放置于历史之中勘探其形成过程与形成原因。同时,历史意识也意味着从现实意识出发,并在辩证意识与全球意识之中全面而深入地思考问题。这些思想层面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的重要共识,是指导我们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与发展的重要思想方法。

### 三、新时代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整个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形态”的建设早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在改革开放以来得到持续关注。“当代形态”建设鲜明地表达出中国学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继承与发展的创造性意识。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日益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与新技术浪潮。这一时代变迁使人们面对着与几乎整个 20 世纪迥然不同的社会状况,诸多人以“小时代”为当下命名。就 20 世纪中国而言,无论是“五四”前后由传统到现代的启蒙浪潮,还是 30 年代相对开放但仍颇具精英主义倾向的多元化格局;无论是

40 至 70 年代由阶级斗争主导的革命浪潮,还是 80 年代由精英主义主导的新一轮启蒙思潮——无论突显精英的作用,还是张扬大众的力量,均以充沛的社会—政治关怀形塑着大时代的宏大叙事。而到了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与商品经济的兴起,社会思潮日益世俗化,以救亡、革命、启蒙、改革等宏大叙事话语为标识的大时代突然在人们中间不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人们更多地关注着自己周遭的生活与其中琐碎的日常话题,在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大时代似乎被所谓的“小时代”取代了。人们感受到并通常认为,较之大时代,小时代丧失了救亡、革命或启蒙的主导性社会—政治话语,代之以“告别革命”、弥漫于商品经济大潮之中的世俗话语;小时代丧失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代之以社会大众沉溺于自身周遭日常生活的平庸心态;小时代丧失了对神圣、崇高和终极意义的强调,代之以对世俗生活的原生态与庸常性的认可;小时代丧失了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与既定秩序的一元化格局,代之以主流秩序的多元化以及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不断位移。

然而,“小时代”的命名虽然部分地描述出了一些时代事实,但却并非一个能够深刻把握时代特征的命名。19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国家地位提升,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愈加显眼,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问题也随着中国崛起成为国内外备受关注的课题。对于中国来说,当下的历史机遇并非“小时代”能够概括的。“小时代”的命名之所以不恰当,还在于社会文化乃至人们生存处境的巨大变化上,而这正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现实背景,因而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已然不是马克思所面对的社会,也不是马克思理论所直接针对的社会。

马克思没有经历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乃至“景观社会”极其蓬勃的野蛮生长,没有经历现代艺术的更高阶段以及后现代艺术的兴起,更没有经历飞速发展的数字网络信息技术。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络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重构了全球的社会结构与生活状态。这次技术革命不仅在广度与深度上媲美工业革命,还以绝对的现实紧贴人们的生活与心理因而没有引发反抗——而工业革命曾引发持续的反抗运动。随着网络的兴起与电脑的普及,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而随着智能手机日益成为人们身体的一个器官,人们更加深刻地改变了自身的生存方式。在网络建构的信息世界中,每个人都化约成了一个号码存在于其他人的手机之中,同时化约成了多个账号生存在网络的无边疆土之上。在工业社会的工厂里,人们是机器的一个零件、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而在信息时代的网络中,人们是无数信息空间中的信息创造者、发送者、传播者或接受者,即成为信息的一个零件或一个环节。这种“虚拟世界”甚至自成一个“景观社会”,并包纳着大众文化与现代—后现代艺术。

社会状况的新变对马克思而言是闻所未闻的,现

代社会的新发展实际上带来诸多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当代形态”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更是无法回避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与当代发展主题的矛盾。马克思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不仅要解释世界,还要改变世界。马克思思想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革命是他所主张的通向解放之路,因而革命话语实际上是马克思著作一以贯之的话语形态。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民主革命的退潮和中国社会救亡与现代政治革命的完成,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时代主题,中国已转入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平稳建设之路已经取代了暴力革命内容。在此,马克思的革命话语与当代发展主题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时空错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要“告别革命”,历史无法“告别”,同时也不意味着马克思思想已经丧失了现实意义。相反,中外理论家仍然把马克思主义视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和问题框架来解释现实,从近年来以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美国学者大卫·哈维关于《资本论》的系列研究成果为代表的一轮“《资本论》热”来看,马克思主义并未因时代变迁而丧失其生命力以及现实意义。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在理论层面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与当代发展主题的矛盾。显然,这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关注过但未曾彻底解决的问题。

其次,与上述问题相伴随的问题便是“术语革命”与现实问题之间的矛盾。建立起独特的术语(概念)系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持续发展的前提。概念术语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框架、结构形态与话语系统,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石。“术语”革命就是对概念或范畴的新解或再造,由此激活理论整体。理论创新依赖于“术语革命”,一种理论如要对现实具有持续不断的解释力,必须进行“术语革命”。如前所言,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络等新的发展现实是马克思未曾经历的;此外,全球化、生态环境问题、女性(性别)问题、核问题等在马克思时代还未严峻地呈现出来,而生命政治问题、后人类问题等也未曾被揭示。显然,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由于解释现实与理论创新而需要“术语革命”。但矛盾在于,“术语革命”难以跟上现实问题的步伐,目前的理论术语大大滞后于现实问题,由此导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只能呈现重复、贫乏乃至空洞的理论表达。

再次,对中国而言,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也存在着矛盾。就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而言,广泛存在的共识是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强调中国意识,标举中国特色。这种对中国性的强调并不简单是一种护卫本土、以本土优先的姿态,而是一种关注本土现实与本土问题的考量。易言之,强调本土意识并非只是出于所谓“失语症”的现代压力,而是一种解决本土现实问题的内在要求。然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引介国外理论持续偏热,原创性理论研究偏弱,主流学术话语也呈现着以西方为主导的态势。这并不是说中国之声始终处于失语状态,而是说术语、方法与问题意识主要来自西方。“以西释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极容易在语境错位之中而削足适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同样如此。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中国社会状况更加与西方社会相似。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当然具有一致性乃至同一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面对的所有问题(尤其是一些根本性问题)都一致或相同。这里并不是说要反对西方或人为地弱化西方理论的影响,而是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致力于一种创造性研究,而弱化依附性、输入性研究。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学术话语之间的矛盾体现了我们在创造力上的一些不足。因此,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建设和创造性研究,一方面要持续广泛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之中的真理性内容,以此指导文艺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在当代纷繁复杂的理论场域中不唯时尚是求,在认真辨析诸家诸派之后去粗取精;另一方面则要立足本土,强化“中国意识”,充分关注本土现实与本土问题,在术语、方法与问题意识等层面有所突破,自觉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代形态的建设。

并且在“文化研究”兴盛的今天,文学基础理论的创造性研究相对疲软。因此,对文学研究而言,当务之急是“深刻认识并切实加强文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加快转变文学理论研究的格局与方式,建立引进与消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妥善应对来自西方学说的挑战,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驱动文学理论健康地发展”<sup>①</sup>。改革开放以来,从复苏到探索,再到主动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持续为中国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注入活力,此后的文学基础理论研究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指导与支撑,反过来,大力加强文学基础理论的原创性研究又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建设以应对时代之变的必然要求。

责任编辑:刘云

<sup>①</sup> 董学文、金永兵《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